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比较研究^{*}

梁严冰

[摘要]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共同书写了中国抗战史和教育史的光辉篇章。与西南联大时使命特征不同的是，西北联大的组建更多体现出国民政府经营西北、优化西北高等教育布局的战略意图；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都播撒了以学报国、兴学求强的种子，西南联大秉持与追求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独立”，与西北联大始终以开发建设西北为己任，自觉服务国家战略的办学理念，都是20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两所大学始终注重教学工作，注意“通识”人才的培养，师生之间相濡以沫；战后无论是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还是西南联大的重返平津，都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西北联大 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 大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G529.6 **[文献标识码]** A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建的两所大学共同体，它们共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其组建与成立不仅在民族危难之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保证了中华文脉弦歌不辍，而且铸造了辉煌的教育成就，是一座永远的丰碑。以往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无论是“通史”性著作还是专题性探讨的论著都相当丰富，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进展。但是，对二者的比较研究相对缺乏。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考察，希望对抗战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精神及国家与大学的关系等提供一观察视野。

一、“战时使命”与政府战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了毁灭中华文脉，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及文化机构进行肆意破坏和摧毁，特别是东南沿海及平津沪等大城市的大学成为他们的主要轰炸目标。如，1937年7月29、30日，日军用重炮和飞机对天津持续轰炸，重点即为南开大学，导致学校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北联合大学史研究”（项目号17BZS019）的阶段性成果。

大部分校舍被焚毁。北平陷落后，日军侵占清华园，教学无法进行，师生纷纷撤离。上海自“八一三”开战以来，各大学同样遭日军蹂躏。同济大学全部被轰炸，上海法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大部被毁，等。据统计，截止1937年10月21日，上海各大学损失总计达6 623 159元。^①

面对日本侵略者毁灭我民族命脉之举，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7年9月对各级学校的处置措施中说明：一方面，“不得不未雨绸缪，预为计划，以减少战事对教育工作之打击。”一方面“责令危险地域各校预为安全措置，如迁移仪器图书等，以防不测，此外关于教科书籍之印刷及纸张供给等事，已陆续订定办法，责成各书局实施。”总体目标是“在战时发生时期，教育工作可以照常进行。”^②但是，随着战局的恶化，教育事业“照常进行”已无可能。如何减少战事对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打击，成为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关于平津专科以上学校处置办法，认为：“平津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学生为数极众，势非借读办法所可完全救济。本部为使优良教授得以继续服务，并使学生完成学业，且隐为内地高等教育扩大规模起见，业经呈蒋院长核准，先在长沙、西安等处设立临时大学各一所。”^③对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9月10日发布第16696号令，以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为基础合组西安临时大学，迁设西安。^④以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院校为基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迁设长沙。^⑤教育部还规定西安临时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不设校长，而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责。指定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等3人。^⑥指定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脩等4人。^⑦西安临时大学成立后，经过紧张筹备，于1937年11月15日开始正式上课，当时全校设有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六学院，共23系。^⑧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9月28日启用关防，10月2日第4次常委会决议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科系作必要调整，凡属三校共有的固应归并，即一校内性质相近的也予以归并，以提高教学效率。归并后长沙临时大学设文科、理科、工科、法商科4科，共17系。11月1日，学校开始上课。^⑨令人震惊的是，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之日，日机突然来袭，幸好日机并未投弹，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两所临时大学在西安和长沙开始上课后，随着日军侵华的进一步扩大化，不得不再次迁移。西安方面，太原失守后，西安东大门告急，危机形势之下，国民政府命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正式离开西安，全校师生于4月底到达陕南汉中。长沙方面，南京陷落后，不久武汉告急，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按照教育部要求，常委会决定迁校昆明，并于同年1月22日和2月4日两次发布“迁校布告”，要求全校师生于1938年3月15日以前在昆明校址报到。^⑩由于学校精心组织，长沙临大师生2月15日从长沙分批出发，经海、陆两条线路安全抵达昆明，如期报到。4月3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两校：奉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规定：“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现为发展西南高等教育，推进边疆文化起见，拟将长沙临时大学移设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院系仍旧。”与此同时，“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院系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并强调“其经费支配及调用教授办法，悉仿西南联合大学办理。”^⑪在汉中初期，西北联大依然设有6学院23系。同年5月2日，两所学校同时开学，西北联大在校本部城固县、西南联大在昆明分别举行了开学典礼。1940年1

月9日，西南联大召开第132次常委会，将以前的科改为学院，设师范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文学院等5院，共26系，另设体育部和先修班。^⑫至此，在民族危难之际，国民政府在西南和西北分别建立起两所大学共同体——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样西迁的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其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却是不同的。相较而言，西南联大的组建更多表现出战时临时性举措的特征，也就是说组成西南联大各高校在民族惨遭侵略之际不得不“南渡”，抗战胜利“复神京，还燕碣”即“北归”是必然的；而西北联大的组建则更多体现出战时过渡性的特征，因为经营西北、提升西北高等教育水平、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分布格局早已成为国民政府的战略构想之一。^⑬也就是说，组建西南联大是抗战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⑭而组建西北联大是国民政府早已谋划与设想实施的国家战略。正因为此，西北联大组建后，1938年7月，联大农学院、工学院独立设置，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组建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师范学院、医学院亦独立设置。^⑮这样，西北拥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农学等较为完整的大学学科体系，国民政府基本达到了其战略目标与战略设想。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国民政府在组建两所联合大学共同体时，学校组成的战略考量、战略思想是清晰的。组成西南联大的各校同质性很强，北大与南开都是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也并非以后的工科性质，而是文理并重。到1934年清华大学逐渐发展为拥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学系的综合性大学。^⑯而组成西北联大的各校显然是考虑到了学科性质，北洋工学院是当时中国最强的工科院校；北平师范大学性质很明确，并且是当时中国师范类的最高学府；北平大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由此可知，西南联大是迫不得已的“南渡”，抗战胜利必然“北归”。组建西北联大则是一长远政府战略，考虑原则是学校性质和学科组成，目的在于改变中国高等教育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的畸形现状，建立现代意义的西北高等教育体系。

其次，西北联大分置国立五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是明确的。这里要说明的是，人们对组建与分置西北联大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如，有认为：西安临时大学组建后，延安对西安的影响与日俱增。故1938年3月，国民党利用“潼关吃紧”、“西安告急”的气氛，强令学校再次迁往陕南汉中一带。^⑰有认为：组成西北联大的“各院校之间门户之见，派系之争，闹独立性者是常有之事。”而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分离之心早已有之”。^⑱还有的认为临大南迁改名西北联大主要因为“一些学生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奔往延安。”^⑲另外，美国有学者也认为：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不无相似之处，但“不幸的是，西北联大不久就沦为私人纠葛与机构纷争的牺牲品。”^⑳由上可知，西北联大分置的主要原因为“防共”和内部矛盾导致。当然，以上观点不是毫无道理，但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西北联大南迁汉中等地，一则是抗战形势严峻所然，学校在西安无法继续正常教学，不得不南迁；二来，仅仅因“私人纠葛”“门户之见”就迅速分解一所国立大学，恐怕也不是在民族危难之际政府的所作所为；三则，如果是为了解决三校矛盾，为什么不分置成原来的三校，而偏要将西北联大分置成五校呢？这似乎于理于情均说不通。所以说，分置五校的真正原因是，国民政府基于对西北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布局与筹划的考虑，即是一种制度性安排。

第三，加强与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是国民政府既有的国家战略。近代以来，西北虽然有一些高等教育的萌芽，但断断续续，尚无建立起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

随着时局的变化，“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响彻云霄，国民政府也不断派人去西北考察，以使开发西北的政策更富有科学性。1942年11月24日，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积极建设西北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明确西北为抗战建国根据地，这样开发西北就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一重要国策。^{②1}而要开发建设西北，又必须有大量的专门高级人才，人才何来？必须在西北建立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各类所需人才。为此，早在1935年12月28日，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就向国民政府致函：建议将在北平的4所国立大学“酌迁一所入陕，易名西北大学。”^{②2}1936年1月3日，邵力子又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天津的北洋工学院“西移”，“为西北大学之基本”。^{②3}1938年4月，国民政府指出：“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②4}同年4月，西北联大南迁汉中后，国民政府对西北联大办学校址等事宜的汇报，明确答复：“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②5}1940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在一次演讲中再次强调：“过去（教育）在实施上及设置地区上均有缺点”，各大学“以致成为地区上畸形的发展”。所以“今后当力显地区上的平均发展，以便提高内地及边区的文化水平。”^{②6}对此，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要提高内地的文化水平，必须“新设若干新校”，而鉴于师范教育为全部教育的基础，故“要求教育的改造与改进必须从师范教育做起”，所以“将西北联大的师范教育，独立设置，改称西北师范学院。”至于医、工、农等若干新校的创设，十分注意高等教育合理化分布的原则。对创设西北医、工、农等新院校，他则讲：“在当时是很费一番努力的。”^{②7}由此可见，与西南联大不同的是，西北联大的组建与分置是国民政府的战略性举措。

二、大学精神与学术取向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和本质内涵。西方大学自从诞生以来，即始终追求学术自由、真理至上与高度自治的办学理念。有鉴于此，近代中国大学在创办过程中，把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独立”，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追求，看作为20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代表。^③

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始终秉持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及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追求，对中国的大学精神进行了完美的诠释和演绎。正如冯友兰所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社会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③1}联大“独立之精神”、“学术之自由”表现最为明显的，首先是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以其独立的意志捍卫学术的尊严。如，1940年7月，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联大再次迁校四川叙永。对此，联大师生提出继续留在昆明办学更合适。最高当局对联大此举表示反对，当局的意见在联大传达后，常委们一致表示，此事的去留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讨论后才能决定。^{③2}于是，联大校务委员会再次开会，最终否决了政府意见。正是联大学人这种不畏强权、独立办学的理念，才能使联大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取得令后人敬仰的辉煌成就。再比如，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曾作出决定，要求在大学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必须加入国民党。对此，西南联大的许多教师则表现出“独立之精神”，如著名化学家、联大教务长杨石先在重庆受训时，最高当局要求他加入国民党，他断然拒绝，并当即表示他可以马上辞去联大教务长一职，但加入国民党一事坚决不从。^{③3}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崧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回忆说：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借军政统一号令，力图控制各大学，到抗战中期，几乎所有大学都被他们控

制，而西南联大则例外。“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联大简直就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坚固堡垒”^②等等。

西南联大教授云集、名家荟萃，各种学术观点、各种学术流派，“中西古今”各种思想纷呈杂然，彰显出独立的学术个性。但是，他们以平和的态度、兼容并包的思想对待各种学术观点，往往是观点相左的人在生活反而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如，联大中文系的一次会议上，学生提意见觉得开设的旧文学课程太多，希望多开一些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对此，系主任罗常培坚持己见。而朱自清却支持学生意见，杨振声也附和朱自清，这样，一场师生座谈会变成了该系办学方向的辩论会。^③会议上争论归争论，但在日常生活中朱自清、罗常培、杨振声关系甚好，平时互相尊重，工作上彼此支持，共同和联大中文系度过了战时的艰难时光。钱钟书到联大执教时尚不满30岁，可谓“少年得志”。大概一方面，颇有点年轻气盛；另一方面，正如冯友兰所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④故而，他对外文系教授的学术水平发表过一番大不敬言论，认为系主任“陈福田太俗，吴密太笨”。钱钟书可能是随意脱口而出，并无恶意，但无论如何已非一般调笑。因为，陈福田曾就读美国哈佛大学，据学生回忆“不但能教小说和散文，对于事务方面也很有才干。”^⑤而吴密是著名的西洋文学史专家，深得大家尊敬。即使是这样，当联大外文系因其他原因决定不再续聘钱钟书时，恰恰是吴密亲自找系里说情挽留他。在西南联大，即使是大学者也没有架子，对学生的一些大不敬行为，平和宽容处之。冯友兰的《新理学》等出版后，蒋介石为了显示其重视学术、尊重学者，特意召见他。但此事却在联大师生中招致非议，一些学生还特意在学校的墙报上画了一幅漫画进行讽刺，冯友兰得知后不但没有批评和指责学生，反而认为漫画画得很像他。^⑥等等。

总之，正是西南联大这种民主、自由的氛围，使得学者们的思想在碰撞、交融中提高与升华了各自的学术水平，并共同为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殿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兼容并包、学术独立的环境，联大时期尽管环境险恶、生活艰难，学者们反而思想激荡、成就斐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如，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西南大后方重建清华研究院，一时间云蒸霞蔚，大师云集；陈寅恪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其经典之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冯友兰在战火硝烟中写成了其“贞元六书”；吴宓用英文撰写了《世界文学史大纲》等名著；钱穆在困苦环境中完成了其传世之作《国史大纲》；金岳霖写就了其哲学体系的经典之作《论道》；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汤用彤在联大完成其著名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吴晗的明史研究经典之作《朱元璋传》在西南联大最终完成；王力撰写出“语法三书”——《中国现代语言》《中国语法理论》《中国语法纲要》；民主战士闻一多先后完成了《神话与诗》《楚辞校补》《中国文学史稿》等；华罗庚在战时发表20多篇学术论文，其著作《堆垒素数论》获教育部嘉奖；周培源在理论物理方面的《激流论》，代表了当时国内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吴大猷撰写的《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在1943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一等奖；杨振宁、李政道正是在西南联大奠定了其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等等。^⑦

西北联大的组建、分置与西南联大相较而言，由于其并非是学人的学术自觉，而是国民政府的国家战略。从这一角度审视，有人认为西北联大缺乏大学精神。其实，西北联大是战时和20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另一种阐释与解读。

西北联大及其分置后的子体各院校自觉服务与践行国家战略，将开发西北与建设祖国辽阔边疆始终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联大学人深刻认识到没有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就不可能

有真正的学术独立；没有民族的自由，就没有学术的自由；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离不开国家战略的自觉实践。^⑧正因为此，西北联大创办后，在办学理念上即自觉坚守“发扬民族精神，融会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⑨的高远追求。西安临大创办伊始，即认为应“以复兴西北古代文化自任”。^⑩1938年5月，联大常委陈剑脩报告学校更名西北联大的意义之一，就是要“肩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⑪1943年11月，西北大学创办的《西北学术》月刊创刊，校长赖琏题词，认为西北大学要“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并把缅怀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作为西北大学应负的重要使命。^⑫编辑部主任郭文鹤在《发刊词》中也指出：西北大学不但要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还特别要“对西北建设有所赞益。”^⑬在此理念指导下，西北联大先后被分置为国立五校后，大家深知这是一种战略需要，故而联大师生在情绪上虽然有波动，但仍然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大局为重，遵照政府战略意图完成了分置和重组，最终实现了国家发展西北高等教育的战略构想。^⑭并在办学实践中始终以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己任。

为了为开发西北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西北联大自觉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与调研活动。其中既有李书田等人“探察天然资源”^⑮的艰辛调研；又有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远赴边疆；^⑯也有西北大学与西北工学院联合组织的对西北各省区进行的国防、地质等实地考察；^⑰同时，还有黄文弼等对丝绸之路及西北边疆所进行的考古工作。^⑱等等。这些科学考察与学术调研活动，对于西北开发与建设作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理论与实践上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北联大还对传承与发掘整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西北联大校歌中：“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⑲反映出联大师生发扬民族精神，继承民族优良传统所奉献的热情与青春。联大还专门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陈列考察与发掘所得之文物，等等。总之，西北联大“实际担负建设西北文化之使命矣！”^⑳此外，西北联大为了为西北开发与边疆建设培养专门高级人才，1944年秋，学校专门成立边政学系，并以“实地到边疆去”为口号，教导学生关注边疆问题，到边疆实地去工作。^㉑西北工学院在抗战期间培养学生2222名。^㉒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留在西北，为西北开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西北联大主动服务国家建设战略，从而形成了开发西北、奠定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自觉，也使得西北联大学人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西北风景线”。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对西北边疆三次科学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出《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等开创性著作；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在城固6年间，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余篇，1940年出版的著作《方志今议》，成为指导中国现代方志编撰的经典之作；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丁山《殷本纪》《先秦民族与神话》等先后写成；陆懋德的《中国上古史》与黎锦熙的《方志今议》，一起在1941年获得了教育部的著作发明奖；秦汉史专家冉昭德完成了其重要著作《汉西京宫殿考》；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王子云写成了《汉代陵墓图考》；考古学家何士骥撰写了《石刻唐兴庆大明太极三宫图考证》《陕西渭河沿岸各县古迹调查报告》等著作与发掘报告；土耳其语言学家杨兆钧等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主编、撰写了《维汉词典》；蒙古语学者谢再善开始编纂《蒙汉词典》；另外，罗章龙取材丰富、考证严密的《中国国民经济史》在这一时期出版；地质地理学家殷祖英《西北地理及政治地理》、张伯声《陕西城固地质略志》、郁士元《城固地形图》等重要论著也在陕南城固完成；^㉓等等。

总之，与西方大学发展历程不同的是，中国大学自从诞生之日起，其发展历史就与民族独立、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其间大学学人的学术志趣与学术爱好因为境遇不同可能各有特点，但都播撒了以学报国、兴学求强的种子，并为融汇世界思想、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神圣学术殿堂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的办学理念、办学追求，都是 20 世纪中国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

三、教师、教学与学生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不仅赓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而且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承载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始终注重教学工作，注意“通识”人才的培养，师生之间教学相长，风雨同舟。据统计，1937—1946 年，西北联大及其子体国立 5 校拥有教授 505 名、员工 1489 名，阵容强大、专家云集，抗战八年共培养学生 9257 名；^⑤1937 年 9 月至 1946 年 7 月 31 日，西南联大在 9 年中，先后到学校执教的教授 290 余人，副教授 48 人，在校生 8000 人，毕业的本、专科学生及硕士研究生 3882 人。^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日后作出重大贡献者不乏其人。

西南联大在长沙临大时期，三校师生离乡背井，辗转千里，教学科研条件极差，上课连小黑板也不能满足供应。师生居住房屋破败陈旧，夜晚教师们只能借菜油灯备课。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被子上蒙油布，枕畔支雨伞，方可入睡。^⑦抗战时期，教师薪金难以支给，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到达昆明后，物价上涨，生活更是捉襟见肘。陈寅恪写诗形容当时生活的艰难：“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⑧迫不得已，有的教师只好把从平津带来的书籍、衣物低价出售。吴晗不得已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著作低价转让；生物系教授沈嘉瑞把仅剩的几个空箱子变卖；闻一多在生活断炊的情况下，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家用；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生活困苦，忍痛割爱将初生的第三个小孩，送给别人抚养。^⑨等等。即便如此的艰难，教师们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当中，视教学为天职。当时，敌机频频来袭，教学无法正常进行，教师们往往是把没有上完的课带到郊外继续进行。社会学系教授陈达一天早上上课时，突然空袭警报拉响，他欣然同意学生到郊外躲避警报兼上课的请求，最终把人口问题课带到“小山充满树林”的郊外讲授。^⑩周培源、吴大猷等，因为敌机空袭只好住在昆明郊外 10 多里地的地方，为了给学生上好课，不辞数小时辛苦跋涉。这种对教学和学生负责的精神，深受同学们的敬重。^⑪联大在战时艰难条件下，集中财力通过各种渠道，在上海、香港等地买了一批仪器设备，使得理工科各系实验照常严格进行。

而西北联大在西安临大筹建一开始就和长沙临时大学一样，由于国难当头，学校办学就遇到极大困难。西安临大被迫分散安置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教师没有宿舍，只好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学生借住的地方，条件尤其简陋，有的被褥都成问题。学校南迁汉中后，校舍分散在三县六处，在庙宇和破旧的公房里，没有电灯，吃水困难，物资难以保障。所有教师薪金和西南联大一样难以发放，由于多数教师拖家带眷，生活担子更重。1939 年 3 月 27 日，法商学院副教授龚锡庆，在城固所住的茅屋内，一天突然被土匪破门而入行凶刺死，财物被席卷一空。^⑫其他不少教师，风餐露宿，甚为艰难。由于生活环境艰苦，导致很多教师身体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据统计，南迁汉中后，全校百余名教师 20 天内，到校医院就诊的达 326 人次。^⑬难能可贵的是，物质生活的困苦和环境的艰难并没有压垮他们，反而使联大教师对教学工作更加敬业，他们的讲课方式或许各

有不同，但无不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据学生回忆，医学院教授徐佐夏，学问渊博，“讲词平实纯美，令人有亲切之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解剖学教授王颀宁，“上课时两节课一气下来，绝不迟到早退。”细菌学教授汪美仙，“讲课不折不扣，亦无半句闲话。”院长汤泽光“讲课时细语切切，引人入胜。”^⑥化学系赵学海教授：“讲课时严肃而略带微笑，真令我们口服心服，敬佩之至。”^⑦一些教师为了给学生能开出更多的课程，不辞辛劳，一人甚至承担好几门专业主干课程。如历史系主任陆懋德，一人开设4门课，“上课时，先写上满满一黑板，这一黑板，刚好讲到下课，不多不少。”只要他上课，学生中从未有缺席或逃课者。^⑧法商学院王守礼“雄辩式的授课方式”，几十年后依然感染着学生，令它们难以忘怀。^⑨地质地理系主任殷祖英，上课“气宇轩昂，诲人不倦，使人如有坐春风之感。”^⑩等等。西北联大学人这种不计个人名利、甘于奉献，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家国情怀，即使在今天仍令人肃然起敬！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除了注重学生自身专业的学习外，还强调“知识通达”的养成，即注重“通才教育”的原则。不仅使文法科的学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使理工科学生也具有一定的人文科学知识。西北联大为了使具有广博的基础知识，要求文法学院的学生，除必修科目外，还必须选自然科学之一种，并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三科中任选2种作为共同必修科目；而理工科学生除必修国文、外语、中国通史、微积分、高等数学外，还要求要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之一种，并在地质、生物、物理、化学4科中选学2门。^⑪这些课程都是由各系科的有名教师承担。西南联大的做法和西北联大大致相同，一是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择课程，以丰富知识面、开阔学术视野；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强调文理互通，如文学院的共同必修课中即有一门自然科学，两门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理学院学生的共同必修课除了中国通史、社会科学基础课一门外，1942年以后还加了一门伦理学。^⑫三是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如1942年11月开始，文学院举办面向全校的文史讲座，每周举行两次，文史讲座对贯彻“通才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不少理科学生通过听讲座扩充了文史知识。^⑬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正是这种厚基础、通文理、重教学的理念，使得学生在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日后因缘际会，或在实践中勇于探索，或出国深造，逐渐成为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

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之所以在抗战中能度过重重难关，除了民族大义与必胜的理想信念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师生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师生之间亦师亦友，或共同研讨新思想、新材料；或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起做实验；或共同外出考察调研；或在生活中彼此互相照料，同甘共苦。对此，许多学生回忆起当时的师生关系，都倍感温暖，难以忘怀！

四、扎根西北与重返平津

前面已经提及，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的根本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即西北联大的组建、分置是一国家战略，故而扎根西北是其根本宗旨。

西北联大成立后，经过两次分置，发展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5校。但是，联大独立分置后，主要还是集中于陕南汉中一带，为了达到国民政府的将西北联大向“陕甘一带移布”的战略构想，1940年4月3日，教育部以“渝字1529号”训令，对西北师范学院等迁移再次作出部署：“查本部前为奠定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起见，经廿七廿八两年度先后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及私立焦作工学院等校分别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及西北医学院在案。惟各校改组

后仍多集中于南郑城固一带，不足以应西北广大社会之需要。”故而为“谋学校本身之发展，兹经本部通盘筹计，决定西北大学迁设西安、西北工学院迁设宝鸡、西北农学院仍设武功、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西北医学院迁设平凉。”^①上述国民政府的训令，可以说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但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教育部令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暂缓迁移，其它如西北医学院也需“另觅适当校址”。

在迁校的过程中，国立5校首先迁移的是西北师范学院，当时教育部明确规定兰州为西北师范学院永久性校址。并令西北师范学院迁移兰州后，将省立甘肃学院之文史、教育两系并入，以其院址为该院院址。1940年6月中旬，教育部长陈立夫到城固视察，嘱院长李蒸与其一起到兰州勘察院址。李蒸随同陈立夫考察后，认为学院设在兰州是正确的，“当然为重视师范教育之故”，但发现两大困难：一是甘肃学院校舍不能用，一是与甘肃学院合并有问题。^②于是，在该年8月31日，学院向教育部呈文，说明另辟校址原由：认为本院“欲为永久基础，自宜有远大计划。”而现在校址“既有轰炸之虞，将来亦多尘嚣之扰。”故“实不足以实现应有之使命”。^③学院的永久校址应该慎重考虑，重选校址。最后，学院选定了离兰州城约7公里，离黄河3公里的一个平坦之地为永久校址。^④校址选定后，国民政府选择了分期拨款建设、分批迁校的方案。1944年底，经过几年的筹建，终于在兰州十里店建成了占地300亩，分东西两区的完整校园。^⑤

至于西北大学的迁移问题，前文已提及，1940年4月，教育部令西安为西北大学永久性校址。对此，当时教育界权威人士均认为政府的决策是恰当的，“计西大设在西安，以其为西北最大之城市，而西北最高学府之西北大学，设在此，亦很适当。”^⑥但鉴于客观形势，教育部令西北大学暂缓迁移。1945年2月，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去重庆参加会议，遂拜会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并汇报校务，蒋介石“垂询本校永久校址问题，以为确定在西安甚为合宜。”^⑦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20日，刘季洪就迁校复原事宜再次请示教育部，回复明确表示以原东北大学西安校址为该校使用。1946年5月，西北大学迁设西安。8月，西北医学院并入西北大学。^⑧1950年5月，西北大学医学院又独立设校为西北医学院（该院1956年改称西安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安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西安交通大学为医学部。）

西北工学院永留西北是国民政府既定方针，但其校址的选定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1940年4月，教育部已决定宝鸡为西北工学院永久院址，因为宝鸡为西北重要工业基地。1945年，抗战胜利高校复员开始后，通盘考虑西北高等教育布局，又改定甘肃天水为学院院址。但是，全体师生都以西安地点适中，一致主张复员西安。当时，学校两度赴渝交涉，1946年3月，国民政府指令西北工学院复员西安。^⑨

与其它国立4校稍有不同的是，国立西北农学院的迁移及永留西北似乎更顺理成章。早在1937年9月，教育部在指定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时，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校长辛树帜即为其中之一。西安临大成立初期，学校即致函探讨拟将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等8个系设于武功，9月17日，辛树帜复函“极表欢迎”，^⑩但由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一时无法解决相关设备、校舍等问题，于是10月11日，西安临大筹备委员会复函：“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暂时在西安城内及附近已有之校舍设法上课。”^⑪1938年7月，国民政府令西北联大农学院独立设校，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后，随即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1940年4月3日，教育部以“渝字1529号”训令：西北农学院仍设武功。

由此，西北联大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与制度较为系统地植入了西北地区。现在的西北大学就

②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27、27页。

④⑤杜元载：《革命文献——抗战时期教育》，第5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第27、27页。

⑥西北联大校刊编辑组：汉中：《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第14、23页。

⑦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49页。

⑧⑨梁严冰、方光华：《抗日战争与中国高等教育》，武汉：《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10期。

⑩⑪⑫⑬⑭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中的洗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2000年，第79、80、81、84、85页。

⑮西南联大《除夕副刊》编：《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⑯方光华：《西北联大与大学精神》，北京：《光明日报》2013年8月28日，第16版。

⑰⑱郭文鹤：《发刊词》，汉中：《西北学术》创刊号，1943年11月12日，第1~2、1页。

⑲⑳西安临大校刊编辑组：西安：《西安临大校刊》第11期，1938年2月28日，第6、6页。

㉑赖琏：《题词》，汉中：《西北学术》创刊号，1943年11月12日，扉页。

㉒⑳西北大学学人谱编委会：《西北大学学人谱》，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192页。

㉓⑳⑳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年，第7、8、21~22、20、49、63、65页。

㉔⑳梁严冰：《西北联大与边政学研究》，西安：《西

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㉕张光慎：《西北工业大学的多元文化传统》，《休闲读品·天下》，第2辑，2012年，第55页。

㉖方光华：《记住西北联大》，北京：《光明日报》2012年8月19日，第15版。

㉗⑳⑳西北师范大学校史资料编研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料摘编（1937—1949年）》，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19~20、21、21页。

㉘《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二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呈教育部文》，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民国档案33号，全宗号006卷。

㉙梁严冰：《李蒸与中国现代师范教育》，上海：《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6期。

㉚刘基等：《西北师范大学校史（1902—201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㉛“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602页。

㉜西北工业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工业大学校史》，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㉝⑳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史稿（1934—2014）》，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0页。

㉞⑳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7、452~453页。

作者简介：梁严冰，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54

[责任编辑 李振武]